

印度穆斯林种姓摭议*

蔡 晶

穆斯林种姓是印度乃至南亚地区的特殊历史文化现象，它形成于中世纪时的印度，经历一定的发展变化后，以一种隐性的方式呈现。从构成形式上来讲，印度穆斯林种姓依出身尊卑划分为阿什拉夫、阿吉拉夫和阿贾尔；各种姓集团也具有传统的印度教种姓制度的一些基本特征，即存在等级秩序、流行内婚的习俗、部分种姓与世袭的职业有传统的关联。印度穆斯林种姓与印度教种姓制度并不具有同等意义。种姓作为印度穆斯林社会关系的一部分，呈现出其自身的一些特点。从整体结构来看，印度穆斯林种姓分为两大部分，即源于穆斯林群体特有的等级关系和源于种姓制度的等级关系，因而体现出混合文化的特质。

关键词：种姓 种姓制度 印度穆斯林

作者：蔡晶，1981年生，河南理工大学文法学院讲师，博士。

一、“印度穆斯林种姓”概念辨析

关于“印度穆斯林种姓”的概念，学术界表述不一。“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在线”将其表述为“伊斯兰种姓”（Islamic Caste），^②但这一提法是否恰当值得商榷。它既没有突出印度乃至南亚穆

* 本文为2011年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印度穆斯林种姓源流考”（项目号：2011-QN-188）的阶段成果之一。

② “Islamic caste”,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Online. 19 Oct. 2009. <<http://www.britannica.com/EBchecked/topic/295708/Islamic-caste>>。笔者将该词条摘译如下：由于接近印度教文化，而在印度和巴基斯坦发展起来的社会分层单位。南亚穆斯林中，大部分是由印度本土居民构成，尽管在伊斯兰教的平等主义信仰之下，这些皈依者仍持续他们的印度教社会习俗；但同时，印度教徒也通过给予穆斯林统治阶层一定的地位而接纳了他们。南亚穆斯林社群中有阿什拉夫（ashrāf，阿拉伯语，shūrīf的复数形式，贵族）和非阿什拉夫（non-ashrāf，印度教徒改宗者）之分。前者被视为阿拉伯移民的后裔，并进一步划分为四个亚群：（1）赛义德（Sayyids），最初是指穆罕默德之女法蒂玛（Fātimah）和女婿阿里（Alī）的嫡系后裔；（2）谢赫（Shaykhs，阿拉伯语，首领），主要是阿拉伯或波斯移民的后裔，但也包括一些改宗的拉其普特人的后裔；（3）帕坦（Pashtuns），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西北部操普什图语的部落成员；（4）莫卧儿（Mughals），随莫卧儿军队进入印度的突厥人。非阿什拉夫穆斯林种姓在地位上分属三等：地位较高的是由高种姓印度教徒，主要是拉其普特人改宗而来，但未被纳入谢赫种姓者；其次是工匠种姓群体，比如居拉哈（Julāhā）原先是织工；最底层的是由不可接触者改宗而来，仍操旧业者。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些由印度教徒改宗而来者对内婚的遵循，与印度教徒的情况近似。印度教种姓制度的两个主要的原则，即共餐限制和内婚习俗在伊斯兰种姓中的表现有所变化。阿什拉夫和非阿什拉夫之间，穆斯林和印度教徒之间，以及非阿什拉夫的各种姓之间都是禁止共餐的。此外，穆斯林更倾向于近亲结婚（比如，与叔伯的女儿结婚），这在南亚被称为勃拉达利（birāhdārī）。

斯林种姓相对于整个伊斯兰世界而言的鲜明特性，也没有准确呈现其社会属性。北京大学唐孟生教授在《关于德里苏丹国时期的穆斯林种姓》一文中，使用的是“南亚穆斯林种姓”，^①笔者认为，这种提法更为合理。

从表面上看，“伊斯兰种姓”与“穆斯林种姓”所指涉的似乎是同一种现象，但二者意义指向却有所差异。区别就在于：种姓应当被视为一种宗教现象还是社会文化现象。“伊斯兰种姓”的说法是比照“印度教种姓制度”而言，但二者不可同日而语。我们讲“印度教种姓制度”，其逻辑是，种姓的概念首先产生于种族差别，继而形成于生产关系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趋势之中，在其框架之下，社会表现为一个紧密结合的等级组织，印度教婆罗门阶层利用了“种姓”的概念，以宗教的形式将这种等级构造固定化和严格化，并限定和承认了人们的地位和彼此间的义务，种姓从而成为一种制度，深植于印度人的观念和生活之中。因此，种姓制度和印度教是分不开的，在印度教之下，种姓这种所有原生民族所共有的观念和习俗得到了特殊的发展和稳固。于是“印度教种姓制度”成为一种惯常的表述方式。

但是，种姓制度被赋予宗教意义，只能说明它具有宗教性，二者之间却并不存在衍生关系。我们称之为“印度教种姓制度”，并不意味着它的形成、发展和影响可以从社会本身的发展过程中剥离出来。实际上，种姓远非一种宗教制度，它更体现为一种社会结构，它并不仅仅局限于高悬于实践之上的意识形态领域，而是始终渗透于政治、经济、社会交往之中。

反观伊斯兰教，伊斯兰教教义的核心是“人人平等”和“信士皆兄弟”。毫无疑问，在伊斯兰教中是不允许种姓存在的，但伊斯兰教和穆斯林毕竟是两个层面的概念。作为社会群体的穆斯林，按照社会地位高低差别排列，这并不必然与其宗教信仰互为因果。并且种姓现象仅存在于印度乃至南亚地区的穆斯林群体之中，并不具有普遍性。它既非伊斯兰意识形态的产物，又缺乏伊斯兰教教义的承载，尤其是在伊斯兰教所提倡的平等主义方面二者更是格格不入。它在穆斯林与印度社会、文化接触与适应的过程中逐渐出现并延续下来，更多的是一种以社会—经济为基础的历史和文化产物。因此，称之为“印度穆斯林种姓”更为合理。

印度穆斯林从其自身立场出发，并不愿意使用“种姓”这个词，他们的信仰也不支持种姓观念的存在，甚至一些正统穆斯林迄今仍否认他们中间存在种姓。自从英国对印度的殖民时代开始，种姓制度被视为印度教的特质。印度独立运动之后，“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开始变成明显相互排斥的社会身份。在此之前，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民众在文化上和语言上更多呈现出一种融合的态势，他们独立的身份感是比较模糊的，各自的宗教身份也并没有十分鲜明的界限，特别是在农村地区，他们的姓名、服装模式、生活习俗也十分相似。在中世纪的印度，无疑也有一些旨在将伊斯兰教纯洁化宗教运动，但其影响毕竟有限。乌里玛热衷于这些活动，而社会—政治上层对此则态度漠然。而到了19世纪后期，社会—政治上层的态度有所转变，他们需要得到自己所属群体的支持以增加自身政治筹码。此时，城市穆斯林上层开始试图给其宗教同胞一个明确的宗教身份感。可以说，是英国在印度的殖民地政治第一次将民主政体带入印度，也是从那时起，群体各自的身份问题开始鲜明地凸显出来。穆斯林和种姓这两个概念都具有了现代意义，但是将二者组合在一起，就变得不合乎逻辑了。一个人不可能是既是一个真正的穆斯林，同时又具有种姓。因此，若论“印度穆斯林种姓”，不啻于论“印度穆斯林即是印度教徒”。因此，印度穆斯林否认种姓的存在，并不是有意而为之，也并不是违背理性或集体隐藏事实的表现，而是出于在当时意识形态语境之下，昭示有别于印度教徒的公众身份的愿望。

但我们知道，在印度，不管是印度教徒，还是其他宗教信仰者，过的都是一种群体生活。印度穆斯林也意识到了这种群体性，并且给这些群体以名称。但他们并不使用“种姓”这个词，而常常使用部落、部族、族系等来指称他们群体内部的小集团。因而表示种姓的“贾特”(zat)或“贾提”(jati)等术语，在印度穆斯林中通常被表述为“勃拉达利”(biradari)、“部姆”

^① 唐孟生 《关于德里苏丹国时期的穆斯林种姓》，《北京大学学报·东方文化研究专刊》，1996年，第53—61页。

(qaum)、“贾玛特”(jamaats)等。这些术语是不同地域、操不同语言的穆斯林的不同表达方式,既表示其社群的种族成分、构成方式,又表示构成较广泛地区穆斯林大群体的地方性单位。在印度北部地区,以及古吉拉特和拉贾斯坦多使用“勃拉达利”和“贾特”(jat)来指称他们的群体;在西北地区,包括德里和旁遮普(Punjab),多使用“郇姆”一词,在南部地区,泰米尔纳德(Tamil Nadu)周边多使用“贾玛特”一词。这些群体在结构、生活方式、族群间交往原则等方面呈现这样的特征:族群内部成员的地位仅由出身来决定,族群边界通过内婚来维持,存在固定职业,也有族群理事会;违背内婚原则会被惩罚;等级较高的族群具有社会优越感,有意保持与其他族群之间的距离,并规定共餐方面的限制;高级族群和低级族群之间的生活方式也有明显差异。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我们可以把它们看作身份群体或阶层,但是结合特定的文化语境,通过观察这些族群的特征并比照印度的种姓制,鉴于二者之间的对应关系和一致性,我们将其称为“印度穆斯林种姓”。

二、印度穆斯林种姓的构成形态

印度穆斯林种姓分为三大类,阿什拉夫(Ashrāf)、阿吉拉夫(Ajrāf)和阿贾尔(Arzal)。阿什拉夫又分为四个种姓,分别是赛义德(Sayyid)、谢赫(Shaikh)、莫卧儿(Mughal)和帕坦(Pathān),依照血脉和世系进行划分,其中与先知血脉最近的赛义德在印度穆斯林群体中地位最高。阿吉拉夫又分为两类,第一类是部分高级种姓印度教徒,尤其是非贵族的拉其普特改宗者,第二类是职业种姓。而在阿什拉夫和阿吉拉夫之外,还有一类种姓阿贾尔,包括了大量不可接触者。印度穆斯林种姓基本上由这三大类构成。

1. “阿什拉夫——”高贵的种姓

“Ashrāf”是阿拉伯语“Sharif”的复数形式,意为尊贵的。这类种姓由外来穆斯林和少数印度本土封建贵族改宗者构成。外来穆斯林主要来自阿拉伯、波斯、土耳其或阿富汗;印度本土封建贵族改宗者多为拉其普特贵族。在比哈尔、北方邦和孟加拉等地区,赛义德、谢赫、莫卧儿和帕坦构成了“阿什拉夫”。^①

赛义德“Sayyid”意为“君王”,也被称为“圣人的后裔”(Pirzāda),或“值得尊敬的人”(Mashāikh),是先知的女儿法蒂玛(Fātima)的后裔。他们多为随穆斯林军队进入印度的宗教导师、士兵和冒险家,来自土耳其、阿拉伯半岛和中亚。赛义德在南亚地区广泛分布,很难讲目前有多少赛义德真正属于外族血统,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的数量不多。15世纪上半叶,赛义德支系曾在德里建立过短暂的统治。

谢赫“Shaikh”意为“长老”、“酋长”或“宗教学者”。在其他穆斯林国家,尤其是在穆斯林征服早期,这个词常用来指虔诚的精神领袖和宗教导师,但在印度,它是指一个特定的群体,包括迁入印度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的后裔,以及改宗伊斯兰教的拉其普特贵族。谢赫多来自先知所属的古莱希(Quraishi)部落的三个支系。西迪吉(Siddiqī),是第一任哈里发艾卜·伯克尔(Abu Bakr)的后裔,意为“诚实的”;法鲁吉(Fāruqī)是第二任哈里发欧麦尔·法鲁克(Umar - al - fāruq)的后裔,意为“甄别真理与错误者”;阿拔斯(Abbāsī)为穆罕默德的叔叔阿拔斯(Abbās)的后裔。但是谢赫现在仅仅变成了一个名号,改宗伊斯兰教的印度教徒都愿意使用这一名号。谢赫属逊尼派穆斯林,在印度的北部和中部,以及巴基斯坦和孟加拉都有分布,地位仅次于赛义德。尽管从理论上讲,伊斯兰教中没有种姓等级,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群体间的通婚并不普遍。在一些地区,通婚或会发生,但主要发生于谢赫和赛义德之间。谢赫或在城市

^① Imtiaz Ahmad, *Lived Islam in South Asia*. Delhi: Social Science Press, 1977, p. 9.

从事某种职业，或从事农业劳作。

莫卧儿“Mughal”是“Mongol”（蒙古人）的波斯语用法，这个词在早期是用来指随蒙古军队进入印度的群体。蒙古人在成吉思汗（Chengiz Khān）征服世界的运动之后征服印度。莫卧儿多为中亚人种的后裔，但也融合了其他血统。法国旅行家弗兰科斯·贝尔尼尔（Francois Bernier）解释说，在奥朗则布统治时期，该词被用来指“白人、外族人和伊斯兰教徒”。^①和谢赫一样，“莫卧儿”被一些农业部落和改宗者使用。

尽管莫卧儿王朝在1857年灭亡，但是直到现在，莫卧儿人在印度、巴基斯坦都有分布，在旁遮普省尤为众多。在不同的时期，他们或被称为穆斯林部落，或被称为穆斯林种姓。莫卧儿人也受到较高的尊敬，他们中的女性仍然蒙以面纱。

帕坦（Pathān）是指阿富汗及巴基斯坦西北部操普什图语言的部落。^②“Pathān”与“Rohillā”（洛希拉）同义，意思是居住于山区的人。实际上，洛迪王朝的建立者巴鲁尔·洛迪（Bahlol Lodi, 1451~1489）是第一位帕坦或者说是阿富汗苏丹。而且，德里的另外一个帕坦统治者，来自舍尔沙·苏尔（Sher shāh Sur）家族，是胡马雍（Humāyun）的反对者。^③贾汗吉尔时期（1605~1627），乌里玛汉贾汗·洛迪（Khānjahān Lodi）编撰了《阿富汗的宝藏》（Makhzan-i-Afghānī）一书，其中提到了阿富汗人的起源。^④现在，有一些商人被称为帕坦，将早期普什图游牧民进入印度平原时就已流行的习俗沿续下来。

由此可见，印度穆斯林阿什拉夫种姓是外来穆斯林文化特质携带的结果，保留了其原有的等级划分标准，并最终与政治和经济实力联系起来。但这些高级种姓在印度穆斯林中只占少数。与印度教种姓制度中的高级种姓一样，他们也自命为天然的领导者，控制着印度穆斯林的观念和宗教与社群组织。

2. 低劣的种姓——阿吉拉夫

根据印度1901年人口普查报告，阿吉拉夫包括“在比哈尔和北孟加拉等地区那些被称为新穆斯林的各阶层改宗者，也包括各种职业群体，比如，织工（Jolaha）、梳棉工（Dhunia）、榨汁工（Kulu）、蔬菜贩（Kunjra）、理发匠（Hajjam）及裁缝（Darzi）等等此类。”^⑤阿吉拉夫可分为两类。

（1）穆斯林拉其普特（Muslim Rajputs）。指那些未被纳入谢赫种姓的拉其普特改宗者。1931年印度人口统计表明，在北方邦密拉特（Meerut）地区，穆斯林拉其普特仍作为一个独立的种姓存在，其人口总数约为166,658。在其他地区也有分布，只是数量很少，有些甚至融合入其他穆斯林种姓。在西部地区，穆斯林拉其普特仍为数众多，他们不愿意与地位上居于他们之下的穆斯林职业种姓交往，形成了一个单独的群体。他们确信自己拥有更高级的血统，倾向于与阿什拉夫通婚。但是后者并不乐于接受这样的婚姻。因此，穆斯林拉其普特便在自己的种姓集团内部选择配偶。若实在找不到合适的配偶，他们便会在与其地位相当的印度教徒中选择，因此，北方邦西部地区的一些拉其普特家庭夫妻一方为穆斯林，而另一方为印度教徒。^⑥

（2）职业种姓。是指由印度教洁净种姓改宗伊斯兰教者，比如工匠（Barhai）、裁缝（Dar-

① Francois Bernier, *Travels in the Mogul Empire*, A. D. 1656~1668.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14, p. 209.

② *Census Report of India*, 1901, i. 293ff.

③ Vincent A. Smith, *Oxford History of Indi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253.

④ B. Lewis, Ch. Pellat and J. Schacht (ed.), *Encyclopaedia of Islam*, i. 151.

⑤ *Census of India*, 1901 (Vol. I), Calcutta: Bengal Secretariat Press, 1902, p. 543.

⑥ Ghaus Ansari, *Muslim Caste in Uttar Pradesh: A Study of Culture Contact*. Lucknow: The Ethnographic and Folk Culture Society, 1960, p. 40.

zi)、洗衣工(Dhobi)、制陶工(Kumhar)、铁匠(Lobar)、理发匠(Nai或Hajjam)、金匠(Sunari)、榨油工(Teli)等。这些职业种姓,在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中都有存在,有时,出于经济联合的目的,这些种姓会团结起来,但是在社会和仪式层面上,每一个种姓又是自我封闭的。在婚姻、宗教庆典等方面,表现形式有所差别。

3. 被压迫的和被损害的——穆斯林不可接触者

印度1901年人口普查报告还记录了印度穆斯林群体中的第三种类型——阿贾尔(Arzal)。他们大多从事清扫或其他不洁的职业。比如,“哈拉库(Halalkhor)、拉贝吉(Lalbegi)、贝迪亚(Bediya)、阿布达(Abdal, 奴仆)等是最为低下的种姓。”^①前三者都从事清洁和扫除的工作,因具体工作职责的不同,又有不同的名称。在印度,这一种姓的人数很多,一并被归入社会秩序的底层,沦为奴隶,甚至更低劣的位置。比如,北方邦大量存在的旁吉(Bhangi, 清扫夫),他们多被禁止进入清真寺。即便是被允许进入,也必须经过精心沐浴并穿着整洁的衣服,并且他们的脚步只能停留在入口的门阶之外。与印度教徒中的不可接触者不同,穆斯林清扫夫可以学习《古兰经》,但不允许教授。^②穆斯林不可接触者的生活也十分艰难,他们多从事仆役、最不洁净和最受轻视的职业,如家庭佣人、饲养牲畜者、沿街叫卖者、人力车夫等,或是从道路上清除牛的尸体,搬运人的粪便等,为其他种姓所非常不齿。并且数以千计的城市清洁工,每天赚到的只有1卢比左右的报酬。^③

由此可见,印度穆斯林的社会结构仍然是等级制的。阿什拉夫骄傲于自己的外来血统,认为他们代表了穆斯林的伟大传统,并且建构了往昔的高贵。实际上,阿什拉夫的地位是通过札吉尔(jagirs, 封地)或柴明达尔(zamindaris, 土地管辖),以及他们对宗教机构和知识中心的控制实现的。阿吉拉夫是改宗者,等级较低,由一些职业种姓构成,印度1901年人口普查报告列举的133个穆斯林种姓^④中,大部分为阿吉拉夫。在印度穆斯林整体社会构造中,还有第三等人,即阿贾尔,他们地位最低。印度穆斯林建构模式的等级化并没有给他们留下所谓权益的空间,他们是整个社会中处境最为悲惨的一类人。

三、印度穆斯林种姓的结构特点

印度穆斯林的社会分割首先在种族差别的基础上进行,分为外来穆斯林和印度本土改宗的新穆斯林两大部分。印度穆斯林种姓也由两大部分构成,即外来穆斯林的种姓和新穆斯林的种姓。二者在划分依据、表现形式和文化内涵上有所不同。

1. 外来穆斯林借用了种姓形式,部分保持了原有的文化传统

外来穆斯林在内婚模式、强烈的出身与等级意识及血统的自豪感等方面与印度种姓制度相一致,因此,他们借用种姓的形式占据了社会的上层,并统称为阿什拉夫,以表示自身身份与地位的尊贵。但是印度穆斯林上层种姓与印度教高级种姓有明显不同。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阿什拉夫以身份作为划分种姓等级的标准。阿什拉夫依次分为四等:赛义德、谢赫、帕坦和莫卧儿。我们知道,印度教种姓制度的划分标准是瓦尔那和贾提,穆斯林阿什拉夫这四等划分并不在瓦尔那和贾提的意义上,而是一种以虚拟的等级来划分种姓的方式。也就是说,赛义

① *Census of India*, 1901 (Vol. I), Calcutta: Bengal Secretariat Press, 1902, p. 544.

② Ghaus Ansari, *Muslim Caste in Uttar Pradesh: A Study of Culture Contact*. Lucknow: The Ethnographic and Folk Culture Society, 1960, p. 50.

③ *Indian Express*, September 20, 2000.

④ *Census of India*, 1901 (Vol. I), Calcutta: Bengal Secretariat Press, 1902, pp. 542—545.

德、谢赫、莫卧儿和帕坦本身都为族姓，只是表示社会结构中血缘关系的符号，本身并无等级意义，却依血统的差别而分出了等级的高下。对血统的重视是阿什拉夫种姓组织的核心，其各自的身份取决于他们与先知穆罕默德或其部落的接近程度。赛义德和谢赫被认为是早期麦加和麦地那穆斯林贵族的后裔。赛义德自称为伊斯兰教先知的后裔，并且“比所有其他的阶层都更加优越。”^①“赛义德是穆斯林社会的王，他们十分执著于维持自身血统的纯洁。”^②莫卧儿和帕坦则为中亚部落的后裔。由此可见，阿什拉夫四种姓的划分与伊斯兰传统密切相关，与伊斯兰源头越近，则等级地位越高。

印度穆斯林种姓出现之初，阿什拉夫-阿吉拉夫之分便呈现出种族间、阶层间分立的姿态，既表明了群体间优劣有别，也表明了地位高低不等。穆斯林在印度建立统治之后，权势完全掌握在穆斯林阿什拉夫的手中，他们的地位与传统印度教社会中婆罗门和刹帝利的地位等同。阿什拉夫构成了统治阶级，垄断了政府和军队的所有高级职位及其他有利的生活资源，并且构成了该社群的知识和宗教精英。阿吉拉夫来自于印度教徒低级种姓者，他们仍操旧业，经济和社会地位并没有得到显著改善。个别有幸实现向较高地位流动的种姓不愿意承认他们原有的祖先，并力图向阿什拉夫转换。在阿什拉夫和阿吉拉夫之间，优越感产生于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以及属于统治阶级的事实。因此，外来穆斯林种姓等级是以某种社会认同为基础，并与政治和经济势力关联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讲，身份便意味着等级。

第二，阿什拉夫种姓与职业并无必然联系。所有的印度教种姓，包括高级种姓，都有固定的职业——婆罗门是传统的祭司，刹帝利是军事和政治精英，吠舍是商人等等。而阿什拉夫穆斯林却并非如此。这是印度穆斯林种姓与印度教种姓制度的一大区别。在现实生活中，从职业上而言，赛义德、谢赫与传统或世袭的职业并没有直接的或特殊的联系。

赛义德尽管宣称自己是伊斯兰教先知的后裔，但他们并不属于祭司种姓或祭司阶层。伊斯兰教从其宗教本身而言，并不允许或认同任何制度化的祭司角色。当然，关于乌里玛的角色是有一定争议的。事实上，乌里玛并不是祭司，他们更像犹太教中的“文士”（scribe，即教法学家，经文抄写者），严格来讲，伊斯兰教并没有传教士，任何穆斯林都有传教的职责与义务，也能带领信徒祈祷。在印度穆斯林群体中，祭司并不作为一个种姓或阶级存在。伊玛目（Imams）和清真寺的宣礼员（Mouazzin）的地位比较突出。在阿萨姆邦大部、曼尼普尔邦（Manipur）和北印度，尤其是比哈尔和北方邦都是这样。他们在印度穆斯林群体中的地位并不如婆罗门在印度教徒中的地位高。对于印度穆斯林而言，祭司既不是经济收益高的职业，也不是声望高的职业，传统的上等阶层并不愿意从事这样的职业。尽管在印度穆斯林中并不存在明显的祭司种姓或者阶层，赛义德在社会行为方面表现出与婆罗门的相似性。正如婆罗门一样，赛义德一向不会从事繁重体力劳动，因为这通常被认为是低种姓者所从事的工作，他们尤其不会从事耕作。在农业为主导的社会，赛义德也严格地遵守职业上的限制。

和婆罗门一样，赛义德也实行内婚。他们通常拒绝族群外的婚姻。赛义德在人口数量上并不是很多。其婚姻关系的选择范围十分有限，兄妹之间的通婚也很常见。^③赛义德认为，在假定的种姓等级体系之中，其他穆斯林较为低下。因此，限制通婚是赛义德排外性的表现，以确保他们与其他穆斯林之间的社会距离。而赛义德遵循内婚原则，更多的是为了保持血统的纯洁，而非仪

① Francis Buchanan, *A Journey from Madras through the countries of Mysore, Canara and Malabar* (Vol. II). London: Printed for T. Cadell and W. Davis, 1807, p. 422.

② Mrs. Meer Hussein Ali, *Observations on the Mussulmanns of India*. (Revised and edited by William Crooke), Karac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p. 4.

③ 除赛义德外，其他种姓并不鼓励这样的婚姻。

式上的洁净。赛义德希望通过内婚或者近亲结婚来保持自身血统的纯洁，以及在印度穆斯林中的高级地位。

第三，部落因素在阿什拉夫种姓识别中十分显著。在印度，种姓集团无疑是一种封闭的身份团体，种姓制度是以宗教为背景的身份制度。这种“身份”不是由经济自然形成的产物，不是行业、职业、生活状况的集合，而是由血缘、职业分工、宗教意识形态等因素综合作用产生的结果。对于一个印度教徒而言，种姓决定了他最基本的社会关系，也决定了他的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但是在印度穆斯林中，种姓的识别并不具有同样的意义。种姓只是穆斯林群体识别的方式之一，穆斯林传统文化的其他因素也交织其中。

阿什拉夫种姓在政治和社会生活方面，十分鲜明地体现出与部落因素的关联。

从政治和社会生活来看，种姓或宗教的识别常常让位于种族和部落识别。当政治利益受到影响，种族本能会超越其宗教训诫。而且一直到奥朗则布统治晚期，宫廷中的群体都是建立在宗族和家族联盟利益的基础上的。

突厥人和阿富汗人构成了外来穆斯林的大部分，他们大多为武士，并且一直都是权力的主要竞争者。伊朗人是什叶派教徒，与逊尼派教徒不同，他们有着悠久的历史承传，并且构成了文化精英，财政和行政职位多为他们特属。大部分的阿拉伯人居住在西海岸，从事商业贸易，除此之外，他们大多垄断了宗教事务。印度著名历史学者苏伦德拉纳特·森 (S. N. Sen) 认为“伊斯兰教的兄弟情谊仅仅在理论上得到公认，在实际上，当政治利益受到影响，突厥人仍是突厥人，波斯人仍是波斯人，阿富汗人仍是阿富汗人，并且他们的种族本能会超越其宗教训诫。”^① 在中世纪的印度，阿富汗人和突厥人之间的斗争是主要的，而另外的两支，即阿拉伯人和伊朗人之间的斗争居于其次。15世纪洛迪王朝统治时期，很多阿富汗人在印度落脚。莫卧儿人当权之时，阿富汗人遭到抑制，并且常常受到怀疑。阿富汗人对莫卧儿人怀有敌意，并且曾一度取代其在德里的统治，其中非常值得一提的是，苏尔人几乎成功地将莫卧儿驱逐出去。

莫卧儿王朝没落之后，部落因素融合入种姓之中，而且，部落姻亲始终占有绝对的主导地位。当莫卧儿势力衰落，来自阿富汗的艾哈迈德·沙·阿布达利 (Ahmad Shah Abdali) 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政治氛围骤变。莫卧儿时期历史学家高拉姆·侯赛因·汗 (Gholam Hossein Khan) 描述了这一变化“有一点是肯定的，普什图语言和阿富汗风格的服饰风靡了整个印度斯坦北部，一直延伸到勒克瑙，在这片地区，统治者们冬天着这种服饰，并使用一些普什图词汇，甚至连妻妾们也坚持在她们的语言中混合一些这样的词汇。”^② 行政开始有了更广泛的基础，并且部落间的通婚也变得频繁。随着时间的流逝，部落间的分裂的确在缩小。根据印度历史学者萨提希欣德拉 (Satish Chandra) 的说法，到了18世纪早期，莫卧儿宫廷生活和政治世俗化突飞猛进。“人们曾普遍认为，莫卧儿王朝晚期宫廷党派之分是以贵族的种族或宗教群体为基础的，这似乎不再有根据。一直到奥朗则布统治晚期，宫廷中的群体都是建立在宗族和家族联系或个人联盟与利益的基础上的。由个别贵族打出的种族和宗教的旗号只是为了适应其一时之需，并且实际的群体分类与种族和宗教划分相反。”^③ 这种倾向随着莫卧儿王朝的迅速衰亡而加速。印度历史学者 V. K. 巴瓦 (V. K. Bawa) 对19世纪中叶海德拉巴的描述可以印证这一点。那里是莫卧儿传统留存的地方。“突厥人、波斯人，帕坦人，阿拉伯人与西迪人 (Siddis)、卡雅斯人 (Kayasths)、

① Surendra Nath Sen, *Studies in Indian History*. Calcutta: University of Calcutta, 1930, Introduction.

② Ghulam Husain Khan, Tabatabai, *A Translation of the Seir Mutaqherin or A View of the Modern Times*. Vol. II, Calcutta: printed by James White, 1789, p. 356.

③ Satishchandar, *Parties and Politics at the Mughal Court, 1707~ 1740*. Aligarh: Aligarh Muslim University, 1959, pp. 257-258.

哈特里人 (Khatris)、马拉塔婆罗门 (Maratha Brahmins)、莱迪人 (Reddis)、姆达利雅尔人 (Mudaliyars) 在社会和经济生活中同样重要。部落姻亲在任何情况下都比宗教差别和宗派差别更为重要。”^①

部落主义的影响在印度穆斯林中体现得要比其在印度教徒中更为显著。帕坦和俾路支 (Baluch) 部落以及他们众多的支系和家族聚集在西部地区印度河流域的两岸。某些改宗伊斯兰教的印度教部落, 尽管在宗教归属上有所改变, 但仍保留了他们的组织和排他性。比如穆斯林拉其普特、贾特和古贾尔。

2. 改宗的新穆斯林平移了原有的种姓结构, 保留了印度教的文化传统习俗

印度教徒改宗伊斯兰教的初衷, 是希望改变以前的种姓身份, 而在改宗之后, 穆斯林统治者却强加给他们一种新的身份, 他们或为阿吉拉夫, 或为阿贾尔, 仍处于社会的下层。每一个阿吉拉夫种姓都有一个传统的职业, 有些职业现在仍然存在, 有些则已经不存在了, 通常通过职业就能得知他们的种姓。比如, 在阿萨姆地区, 穆斯林划分为三个种姓群体: 赛义德、谢赫和莫里阿 (Moria)。莫里阿属于阿吉拉夫, 多从事家用铜质器具的制作。而“moria”一词在阿萨姆语中是“敲打”的意思,^② 本身就与该种姓通过敲打制作器具的方式有关。“莫里阿多为铜匠, 他们被轻视为十分不洁的部落”^③ 和“低劣的种姓”^④。或者更确切地说, 职业的名称就等于从事该职业的种姓集团的名称。比如织工、屠夫、榨油工、糖果制造商、手镯商、杂技演员、工匠、乞丐、清扫夫等。

阿吉拉夫和阿贾尔的等级排列与印度教种姓类似。是根据其职业相应的洁净程度来决定。比如, 裁缝的地位高于洗衣工, 因为洗衣工直接接触到身体的污秽。洗衣工高于制鼓匠, 因为后者直接接触尸体。这些与印度教种姓等级都十分类似。但是, 伊斯兰教意识形态传统中洁净和不洁的观念并不在仪式的范畴之内。

由此可见, 印度穆斯林种姓体现出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复合的特征。这是由于印度穆斯林的构成因素十分复杂、血统、部落、宗派, 甚至文化基底都在不同程度地起着作用, 而并不是象印度教徒那样, 建立在一个统一完整的意识形态原则基础之上。因此, 在印度穆斯林中, 并没有一个与意识形态相一致的社会纽带将其系统地组织起来, 而是有许多纽带把他们联结在一起。这取决于其与不同社会群体交往的可能性, 也就是十九世纪苏格兰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 (Thomas Carlyle) 所谓的有机脉络 (organic filaments)^⑤, 即有助于将分裂的元素融合在一起并加以重塑的弹性线索。在印度教徒中, 缺乏某种融合因素来抵销种姓带来的分解力; 但是在印度穆斯林中, 一些有机脉络能够把他们融为一体。我们必须认识到, 尽管印度穆斯林群体中存在种姓, 但是种姓之于穆斯林的意义远不及其之于印度教徒的意义。

(责任编辑: 李建欣)

① V. K. Bawa, *The Nizam between Mughals and British—Hyderabad under Salar Jang I*, New Delhi: S. Chand & Company LTD, 1986, pp. 4-5.

② 参阅 Edward Gait, *A History of Assam*. Gauhati: LBS Publications, 1905, p. 95.

③ William Robinson, *A Descriptive Account of Assam*. Delhi: Sanskaran Prakashan, 1841, p. 264.

④ Devdas Bhorali, *Occupational Diversion: A Caste Study of Moriya Community of Guwahati: It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Gauwahati: Handique College Teachers Unit, 1982, p. 21.

⑤ Thomas Carlyle, *On Heroes and Hero - Worship and the Heroic in History*. London: Chapman and Hall Ltd., 1894, Chapter VII.

Abstracts of the Major Articles

A Methodological Research on Identification and Distinction of Religion

Bai Jianling

The nation is a basic concept in division the groups of human being. That is ,nation is a general rule and a popular phenomenon of the survival of human being. Relig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of sanctification in every nation's internal identification and external distinction. Religion bears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of identification and distinction which applies universally to every nation as a neutral concept. Thus religion has a methodological significance in understanding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different nations.

The Most Outstanding Chinese Romantic Poet Feng Zhi and Christian Romanticism

Li Feng

Using Feng Zhi's poems as examples ,this article is a discussion on the trend of thought in Christian Romanticism refracted in the May 4th New Culture Movement.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emotion and imagination are the internal motives for a connection between the May 4th New Culture Movement and Christian Romanticism to form. Feng Zhi's early life experience had led to his characteristically strong and gloomy lyric style and unique lyric temperament ,on the basis of which his empathy with German Romantic poets ,and thus a partly hidden and partly visible connection with Christian Romanticism could be explain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ay 4th New Culture Movement and Christian Romanticism as embodied by Feng Zhi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European poets and theologians ,whose thought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a "poetic theology" have indicated that theology does not have to be confined to grand halls and lectures; with poetic thinking ,theology can also explore new possibilities and reveal new modes of being.

Some Dimensions of Muslim Caste in India

Cai Jing

Muslim caste is a special social – cultural phenomenon in India and even in South Asia. It appeared under a given historical and practical background ,experienced certain development ,then presented in a hidden way. The caste among Muslims in India is comprised of Ashraf ,Ajraf and Azal in structure. Certain fundamental characteristics of traditional Hindu caste system are also found among Indian Muslims ,namely ,a hierarchically order operates among Indian Muslims ,the various groups in the hierarchy are endogamous ,some of the castes have traditional links with hereditary occupations ,etc. Muslim caste in India differs from the Hindu caste model in certain details. Muslim caste in India constituted of two parts ,which epitomizes mixed culture attributes.

Bamboo King myths and bamboo worship of ethnic minorities in southwest China

zhang Zehong

The intergenerational bamboo king myths of ethnic minorities in southwest China ,show multi – dimensional reflecting the religious ideas of various ethnic groups of the Southwest.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spread and impact of bamboo king myths ,analyses bamboo worship reflected on the religious ceremonies of ethnic minorities in southwest. The paper holds that bamboo king myths which are the characteristics with the original thinking of ethnic groups in southwest imply the cultural elements of nature worship ,totemism and ancestor worship belonging to ethnic minorities in southwest China. Bamboo king myths and bamboo worship have long – term impact on social life of various ethnic groups of the Southwest ,its thinking of the myths reflects religious complex and ecological consciousness of ancestors of all ethnic groups.